

高校规模扩张的「堵」与「疏」

■本报记者 温才妃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从新建校区到异地办学，我国高校规模扩张在不同历史时期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探索。近日，异地办学迎来史上最严禁令。已经选择异地办学的高校如何实现合理“收缩”？下一个规模扩张的“出口”又将在哪里？

异地分校、校区、研究院、教学点、医院……自上世纪 80 年代延续至今的高校异地办学形式不断“翻新”，好不热闹。而这股热闹劲儿，即将偃旗息鼓。

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十四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要求从严控制高校异地办学。不鼓励、不支持高校跨省开展异地办学，特别是严控部委所属高校、中西部高校在东部地区跨省开展异地办学，原则上不审批设立跨省异地校区。吉林、河北已出台相关政策响应。

随着这一纸令下，高校异地办学是否会走向历史终结？最近一次的高校规模扩张经历了新建校区、异地办学，下一个“出口”又将在哪里？

谁在越界

在异地办学的问题上，教育部门、地方政府、高校有不同的需求。

从历史上看，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当局以高等教育布局不符合国防发展需要为由，要求西迁的东部高校原则上不迁，就地转入西南和西北地区。其中，北京师范大学留在了兰州，发展成为现在的西北师范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划分为六大行政区，每个行政区的综合性大学、理工科大学、重点师范大学、重点农业大学、重点医科大学都有严格“标配”。

“把优质高等教育均衡分布在全国各地，体现的是国家意志。”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光礼说。

而市场往往容易把优质资源吸引到最能产生效益的地区。异地办学经历了抢滩深圳和落户苏州、青岛等经济发展迅速的地级市两次热潮。如今，几乎所有的优质高教资源都在向粤港澳、长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聚集。深圳（38 所）、苏州（20 所）、青岛（17 所）成为我国三大闻名的“高校挖掘机”。

在这个过程中，异地办学出现了“新苗头”——中西部重点高校的“东建”“南下”。2000 年西安交通大学设立了深圳研究院，之后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5 所高校相继在东部建立了

研究院或分校，并且其数量不断增加。

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卢彩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廖霞在《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扩张模式与区域走向研究》一文中统计，截至 2020 年 4 月底，“双一流”建设高校异地办学中，西部流向东部 20 个、东北流向东部 13 个、中部流向东部 15 个。

当中，出现了异地校区强过本部的势头。如哈尔滨工业大学南下建立深圳校区，其深圳校区的高考分数线事实上已超过本部，也出现了西部某名校每年将上千名专业硕士招生指标几乎全部投放到广东的现象。甚至有部分中西部省份办学中出现了“主校易址”的呼声，认为这些高校要真正融入大城市，必须把位于省会城市的校区变为本部。

“这些行为已触及高等教育均衡分布的底线，高校办学自主权过于膨胀。高校的办学地点早在大学章程中就已确定，大学章程相当于高校的“宪法”。作为公办院校要服从国家的布局安排，高校没有权力改变办学地点，这是国内外高校一致的原则，即便是美国加州大学分校也是服从政府安排的。”周光礼说。

他进一步指出，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如果西部高校“出走”或变相“出走”，毕业生将来大概率会留在东部，而不是去西部做贡献。从经济发展方面考虑，西部大开发需要人才，强调当地办教育、自己培养人才，才能做到与地方深度融合。

加之，多年以来，异地办学机构权属模糊、与母体差异甚大、教师分身乏术、经费来源争议大等问题导致矛盾重重。与其异地办校区，不如在本地另起炉灶自办大学，成为很多人的呼声。

正因如此，政府才做出了“严格禁止异地办学”的强干预。

从规模扩张到内涵建设

这并不是教育部首次颁布异地办学禁令。事实上，2019 年教育部便对异地办学“不鼓励”“不支持”。此次禁令，相比从前有所升级，如“不审批设立跨省异地校区”“省内异地校区严控数量”“对于现存的高校异地校区逐

步清理规范”等。

在浙江大学北京研究院副院长林成华看来，异地办学应从不同阶段、不同类型两个维度解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我国高等教育扩张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次是上世纪 50 年代末的教育“升级”，几年间我国高校数量由 200 多所上升为 1000 多所；第二次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为了应对“文革”后产生的人才断层，我国在三年之内新增了 300 所大学。第三次是 1999 年后，为了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依托名校办民校成为一种潮流，短短几年办起了近 400 所独立学院；与此同时，2000 年以来，各地各高校异地建研究院、研究生院、分校区等。在第三次规模扩张中，重点高校是最大受益者。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指出，当下，真正有规模扩张需求的并不是“双一流”高校，它们在前期已基本完成了规模扩张，加强内涵建设是这一阶段的要求。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接纳更多新生源的应是高职院校、普通本科院校。“相比前者，它们更有规模扩张的理由。”

在西部高教大幅落后的情况下，“东建”“南下”本是西部高校寻求发展、突破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之一。然而，“禁令下达后，已‘东建’‘南下’办学的高校面临尴尬的局面，何去何从不仅将影响到异地已办起来的校区，还将深刻影响整个大学办学”。别敦荣说。

“禁止异地办学的同时，应给予西部高校比市场调控更大的优惠政策。”别敦荣以西安交通大学创新港为例，若没有国务院相关部门、国家部委在土地、资金、编制等方面的大力支持，仅凭陕西省政府、西安市政府和西安交通大学三方力量难以在短期内将其建成。

令人欣喜的是，相比较前两次计划经济下的布局，第三次高校规模扩张的布局多了市场和地方政府的力量。“政府应当学会用市场和政策杠杆来调节高校办学，为高校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更优越的发展环境。”别敦荣说。

林成华提醒道，以市场为导向的办学，如民办院校，要允许它们大胆探索市场化办学道路。如企业员工进修，异地开设教学点可以就地满足他们学历提升的需求。“相比一律予

以禁止，应是更好的选项。”

“要实现高等教育的整体进步和生态优化，要使民办和公办相互刺激，实现二者的共生与共赢。”林成华补充道。

研究院成为“出口”

周光礼指出，从此次发布的禁令来看，阻止西部高校出走是第一步，不再异地兴办本科教育是主旨。

“未来也不排除政府会采取更严厉的做法。”周光礼表示。对于已经选择了异地布局的高校如何实现合理“收缩”？在他看来，方法有二，第一种相对温和，此前存在的异地校区平稳过渡。第二种相对严厉，此前存在的异地校区整顿清理。比如，让异地分校或校区与本部脱钩，成为一所独立的院校，其过程类似独立学院转设。

别敦荣告诉《中国科学报》，国家虽然鼓励高校去西部地区开展中外合作办学，但是中外合作办学主要受市场主导，真正去往西部地区的高校较少。而高校海外办学的环境受疫情、政治等因素影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近年来脚步在逐渐放缓。

与“堵”相对的是“疏”。那么，下一个规模扩张的“出口”又在哪里？

在本次采访中，专家们一致认为，异地办学的另一种形式——异地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将成为未来高校规模扩张的密集“出口”。单就 2021 年上半年，北京大学与威海共建的海洋研究院、中国农业大学与呼和浩特共建的内蒙古现代农牧业研究院、南方科技大学布局云南研究院……高校布局研究院的信息接连不断。

与前一阶段的异地分校、校区相比，研究院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把异地办分校、校区比作重型坦克，研究院堪比轻型坦克。前者一般规模较大；后者一般规模较小。”林成华打了一个比方。

所谓“小”是相对的。别敦荣表示，它反映的是一个时期的需求，高水平大学的研究生教育规模通常较大，倘若研究院内的教授带领上百名硕士生、博士生服务县、市、区，对地方经济产业发展将会产生巨大影响。

地方政府也有借助高校科技创新力量、人才力量、文化力量实现城市新一轮发展的动力。这在东部地区显现。而在中西部省份中，山西省成为引入东部高校办研究院等机构最主动的省份之一。

“研究院还是未来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最好载体之一。”林成华强调，它能让高校与产业更紧密地结合，一些专业学位研究生来自产业的技术骨干或管理骨干，有利于提高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率，而且在当地招生、培养，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成本。“在实践中学、在学中实践，是一种螺旋上升模式，更能推动产学研合作。”

“这也提示了政府部门在解决问题时，要疏导与支持相结合。”别敦荣补充道。

形式问题与管理问题要区别对待

圈地、拿政府补助，师资欠佳，招生标准降低，产权不清晰……实际上，近年来研究院的发展也颇为外界诟病。

周光礼告诉《中国科学报》，研究院最初成立的目的是进行科技成果转化，国家现行政策也鼓励产教融合，所以允许研究院存在。但从具体的实践来看，研究院主要从事的是高端培训和研究生教育，科技成果转化效应并不显著。

（下转第 6 版）

中国大学评论



尤小立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国家有关部门对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整治，其深层意义或许在于改变培训内容和培训效果极端化的倾向。然而，当下既为“培训时代”，所谓培训的参与者就不止于社会机构，大学的培训化意识和行为也应该在反思和矫正之列。

国内的培训是从“应试”开始的。起初是以高考补习班的形式出现，以后兵分几路，补习班逐渐向中考、小升初以及学前班扩张；“留学潮”则催生出国语补习机构，且从中国人教中国人向外国人教中国人过渡，加之各类考证需求，培训再增添考证的内容。随着大量企业将培训成本推向社会，企业培训也成了培训的方向之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不仅培训机构各式各样，培训内容更是包罗万象，真正了那句流行语——“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做不到的”。

维持社会培训机构核心理念是“为社会需要服务”。从正面看，“社会需要”激发了培训机构的想象力、创造力和聚集财富的能力；从反面看，目标性极强的培训把青少年学生变成了“培训人”，非经培训不能提高生存本领。

其实，在培训初兴之时，主导培训的是各类学校，后来因国家政策的限制，培训转向校外的社会机构。但由于前期培训的“余荫”，目下面对的又是经历多种培训被塑造的“培训人”。他们早年参与培训养成的习惯、思维定势和运用的方法恰好适应眼前教学对象的取向、喜好，不仅使得某些热衷于培训的教师重赏用武之地，教育（学）管理人员仿佛也找到了解决“教学难题”的钥匙。

因此，在某些大学中，为吸引学生选课、上课，可以牺牲课程名称的科学性而随意通俗地命名；为迎合“社会需要”，也可以将校外培训机构开设的课程加以移植，作为大学具有创新意义的“新课”，并给予相应的学分。华东某“双一流”高校今年开设的与烹饪相关的课程即是一例。炒一道青椒土豆丝、包几个水饺、烘焙出一个面包或一块蛋糕等就可以获得 2 个学分，与其说是在进行初级劳动技能培训，不如说是在校内其他理论性课程的一种嘲弄。以“烹饪课”来重建“劳动意识”，是对“劳动”的误解。因为现在所谓“劳动意识缺失”并不是真正的“劳动缺失”，而是对于“劳动”本身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技能、技艺不是不能出现在大学的课程中，但它们必须具备起码的科学性、理论性和系统性。这一大学分科制建立以来形成的基本原则，在如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同样适用。

“培训人”的主要特征就是标准化、浅智化和技术化。其具体表现则是目标性和实用性极强。这里的“目标”往往是直接的和短期见效的，属于典型的急功近利。目标性强的另一表现则是排斥性，即为为了眼前的现实目标，随意砍去影响现实目标实现的枝枝杈杈。反映在学习上，就是只关注与现实目标相关的知识和课程，并且有意无意地将“目标”偷换成“兴趣”，从而为现实功利贴上“合理”的铭牌。

“培训人”极强的实用性，其实就是缺少基本价值取向的随机应变。老师、领导、上级或凡地位高于自己、自己有所求的人想听什么就讲什么，想看什么就秀什么，哪里有空子就往哪里钻。这是出于“培训攻略”的自然延伸和灵活运用。

事实上，“为社会需要服务”中的“社会需要”是一个很笼统、模糊的概念。如果无此自觉，就很容易把大学“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硬生生地套用，弄出个“假两件”，结果就是重视迎合，轻忽提高。上述“烹饪课”以及“恋爱课”“化妆课”在大学里陆续开设都是例证。

但大学与培训机构毕竟不同，甚或在许多根本理念上是对立的。大学总是以个性化反对标准化，以深入思考防止浅智化，以理论性深化技术性。所以，在课程选择和设置时，大学应该首先区分何为“社会需要”，以及哪一种“社会需要”与大学自身的基本定位相匹配。

现在看，只有对校外社会培训机构的整治，没有相应地对大学受培训意识和行为影响的反省和矫正，扭转培训极端化倾向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培训时代”的话题很多，但总是绕不开“浅智”的内容。“浅智”不是“无智”或“弱智”，而是误将浅显当作深奥，且无限放大，断为公理。

要超越“浅智”，最简单的方式是回归常识。大学教育也一样，不忘初心，就是要真诚地重温大学的基本理念，秉持教育的基本精神，对照检省，以便脚踏实地，增强自身，亦有益于社会。

通识教育大家谈

当通识教育遇到“双一流”和工科“专业化”

■李博 陈栋

通识教育是目目前世界上一流高校为应对专业分割过细、学生素质下滑而采取的一种基础性、综合性的教育改革措施，以学生在民族历史文化、人文社科素养、基础科学思维、创新能力等方面全面提升为核心诉求。在“双一流”建设的大背景下，工科高校传统的“专业化”学科发展路径依赖将进一步得到强化。因通识教育的缺乏而导致大学生人文综合素质、创新创业能力等方面的缺失，已严重影响了我国工科院校本科生培养的整体质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人才体系的结构化弊病。

强化“学科”的“双一流”

“学科”是“双一流”建设的基础和抓手，按照“引导和支持高校优化学科结构，凝练学科发展方向，突出学科建设重点，创新学科组织模式，打造更多学科高峰，带动学校发挥优势、办出特色”的战略取向，高校学科发展资源将愈发聚集。

一定程度上，“双一流”建设的资源分配方式加剧了学科发展之间的竞争，对通识教育的生存空间形成挑战。分级支持、强化特色是“双一流”建设的财政支持基本方略，目的是尽快促使一批高校和学科达成“世界一流”。在其建设过程中，工科院校只能“围绕主干学科，强化办学特色”或“突出学科优势，提升学科水平”，这就造成了以往过于分科和专业化发展的工科院校更进一步将有



李博

江南大学教学评估与教师卓越中心副主任



陈栋

江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限的存量资源及增量资源投入既有的优势工科建设中，以保持、争取自身的“双一流”地位，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资源利用的调剂存量和吸收增量的过程中，强化对学科、学校排名更为有利的专业教育，已然成为默会路径，而通识教育则因其“实用性”较低，面临着更加边缘化的危险。我国高校通识教育传统的缺失加上学界对于“通识教育”的内涵缺乏普遍性共识，使得我国大部分高校至今仍处于摸索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有效路径的起步阶段。

三条路径变革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是达成“双一流”建设中一流人才培养任务的关键环节和必由之路。在国务院和教育部等部委发布的两个“双一流”建设指导性文件（国发〔2015〕64 号和教研〔2017〕2 号）中虽并未明确提出通过通识教育路径来

达成“立德树人”的人才培养目标，但却强调了要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法治意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优秀人才”。我们可尝试通过以下三条路径进行通识教育整体变革：

首先是优化通识教育课程配置，打造核心精品课程。以通识类知识的核心脉络统整通识教育选修课程，按照知识素养结构划分为数个模块，各模块由围绕同一核心素养且相互关联的数门课程组成，打造不超过二十门通识教育核心精品课程由学生必修。增加中西方文明、区域和地方文化等课程并与思政类通识教育必修课程构成课程模块，以经典阅读、科研探究、名家讲座等形式丰富和拓展思政类课程的内容，既达成国家规定的课程要求，又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社科素养，培养大学生的家国情怀和学校荣誉感。

其次是整合课程与教学资源，明确各类课程的界限与任务。定位不明、目标不清、

权责不一、效果不良是我国工科院校专业教育之外的课程的共同症结。在国家大力推进“双一流”建设和一流本科人才培养的时代背景下，对所有专业教育外课程进行统整、筛选和界定，进而明确各课程模块之间的界限、任务及协作关系，以核心知识素养模块为抓手重新厘定各自归属和宗旨。对于课程模块的划分、调整以及模块内各具体课程的构成、衔接、考核等事宜，交由通识教育委员会科学决策。对通识教育委员会、学校教务处、学校教学决策团队之间各自的权责予以明晰。

最后是加强顶层设计和长远规划，分步推进通识教育整体变革。明确以通识课程变革、学科大类变革和培养模式变革为核心的“三步走”战略。通识课程变革对学校通识教育整体变革进程起着先导与基础性作用，并为进一步展开学科大类变革与交叉综合学部建设奠定了基础。学科大类变革需要工科高校进行大类招生、宽口径培养和大部制管理等转变，以既具备学科内在关联又体现学校自身优势的大类学科为基础，进行本科生招生与培养。培养模式变革要将一流本科人才培养的触角向前延伸至中学、向后延伸至研究生阶段，建立文理工农医等多个方向的生源基地，将大类通识教育课程简化提前至中学阶段奠基；同时在本科高年级阶段适当引入大类研究性学习课程，激发学生继续从事更为细化的相关研究工作的兴趣，奠定相关能力基础并提供较宽的学业晋升渠道。